

来自第三届中国外语 教授沙龙的报告

THE REPORT FROM
THE THIRD SALON
FOR PROFESSORS
OF FOREIGN STUDIES
IN CHINA

张后尘 主编

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

语言学学风建设的现实与理想

外语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

中国外语学术自主创新

关于外语界做研究的几点想法

“照着讲”和“接着讲”

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THE REPORT FROM THE THIRD SALON FOR
PROFESSORS OF FOREIGN STUDIES IN CHINA**

来自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

张后尘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 / 张后尘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04-022990-5

I. 来… II. 张… III. 外语教学-教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117 号

策划编辑 常少华 责任编辑 陈 丽
封面设计 周 末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2.625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0 000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2990-00

序一

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

——记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

2006年9月,《中国外语》在京举办了“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我在会前赶忙看了一些材料,武装自己,发现所谓“学术规范”是针对“学术腐败”而言的。会前,曾与教育部社科司袁振国副司长一聚,我谈了自己这样的认识:原先我以为学术腐败无非是在学术问题上造假、抄袭、侵权、学霸作风和权力干预,后来发现它也涉及研究泡沫化,一些学校为争取成立学科点“跑点”,评估、评审前“打招呼”,发表作品时攀附著名学者或占有学生成果,或吹嘘自己、自我炒作,甚至一稿多投等等。想到这里,我也不免汗颜,原来自己也不那么干净。看来反对学术腐败非搞不可,杀杀这股不正之风,使我辈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沉沦下去。

除袁副司长外,大会有4个发言重点谈的是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如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清华大学杨永林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和湖南大学宁春岩教授。这些发言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挖掘造成这些歪风邪气的根源。缺乏学术规范教育是个原因,当前国内学术界、教育界的浮躁之风也害人不浅,例如提职称要在一级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而不是首先评价论文质量。其次,没有正确的学术批评,本来学术争鸣有助于学术繁荣,现在一不小心就会结怨。第三,缺乏惩戒机制,听任一些不正之风泛滥。待问题发现后,又不能区分初犯再犯,容易一棍子打死。我总是觉得“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还是需要的。

关于学术创新的报告很多,都是教授们的肺腑之言和多年治学经验

的总结。河南大学徐盛桓教授的“照着讲，接着讲”，激励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往高处爬，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沈家煊教授对“框架多”的观察勉励我们既要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也要在实践中去充实自己的框架，验证自己的框架。北京大学申丹教授介绍了她敢于向国际权威挑战的经验，这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令人钦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尖锐地提出中国还没有创立自己的学派，包括汉语界也是如此。当然他的用意寄希望于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有所建树。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先生有趣的使用了 Chat, Talk, Write 3 个词解释沙龙应该以自由交谈为主，工作坊以讲授示范为主，会议则是宣读事先写就的论文。这对今后的教授沙龙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海洋大学的杨自俭教授发言的另一个重点是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显然任何学科要取得进展没有理论和实践都是不行的。还有几个发言是围绕本土化的，中国语言学者要创新，要在国际舞台上有所建树，要走本土化的道路，研究汉语的种种问题。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结合他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学术水平并不落后，只是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解读，给人造成错误的感觉。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提醒我们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紧密关系。中山大学黄国文教授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的情况。

大会群英荟萃，发言是高水平的，我谈了一些感受，也提出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1) 什么是创新？大会高举创新大旗，上述发言都是各抒己见，为创新献计献策。我补充了一点看法，创新是有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并且要有历史的观点。譬如有人说，《马氏文通》介绍的是西方语言学理论，不算创新。我认为在一百多年前，马氏能把西方语言学引进中国，并且结合汉语进行举例分析，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同样，今天我们引进国人尚不知晓的国外语言学理论或外语教学理论也应当鼓励，如果所谈内容互相重复，才是泡沫化现象。

(2) 传统与革新。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传统不要革新，或者要革新丢了传统，都是简单行事，不利于学术发展。再具体说，我们国家一般都强调“师从”某人，当学生的岂敢说老师的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引导老师认识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理，当老师的在一生中如果培养不出几个能超过自己的学生就不是好老师，知识在原地踏步。其次，我们对学生或年轻人冒出的创新的火花不要轻易地说他“做学问不踏实”，“自不量力”，“吃了几碗干饭”这样的泼冷水的话，或等着看他失败，秋后算账，而是应该多鼓励，要有失败了帮他一把、一起找原因的气概。另一方面，有些年轻人确实也存在自我吹嘘，夸夸其谈的毛病，小有成绩，居功骄傲，把前人说得一钱不值。因此，在科研工作中如何使传统与革新取得和谐是必要的。

(3) 与国际接轨和本土化。在这次沙龙会上，有强调“与国际接轨”的，不然何谓国际水平；有强调本土化的，不然难以创新，难以为国家服务。其实，这二者也有一个和谐互补的问题。我和朋友们编《语言学高级教程》时，我对写词汇学一章的老师说，希望他能提一下徐通锵教授和他的字本位，他多年的苦心研究就是本土化的典范，我们终究对自己的母语最为了解，最能做出成绩。但是我和徐通锵教授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以足球为例，我们可以考证中国是最早玩足球的国家，国际足球联合会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用宋朝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玩足球的方法去改变国际足联的规则毕竟是不可能的。搞语言学研究也一样，你把《马氏文通》批得再臭，你认为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连同它相应的术语和范畴不合国情，是徒劳的。一方面，研究证明，这些术语和范畴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描写分析世界上绝大部分语言；另一方面，与当代语言学完全脱节的本土化术语和范畴很难走出国门，去争国际水平。

(4) 演绎与归纳。为了创新，会上谈到演绎和归纳的问题。国际

语言学界有人这样区分,我这个学派是搞演绎的,你那个学派是搞归纳的。搞演绎的比搞归纳的强,科学性强。我为了这个问题曾请教过已故的杨周翰先生,他解释道,归纳是总结已有成果、发现问题;演绎是提出假设,然后求证。后来,我又捉摸出一些看法,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归纳和演绎。既然是科学研究,你对事物调查分析或者发现问题后,必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提出新的目标,不然调查分析失去意义。同样,搞演绎的如果对现有的事物不进行调查归纳,这假设岂不成了空想。不久前,北京语言大学方立教授请我参加他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他是搞形式主义的,我看到论文中这位学生演绎出的规则请了很多操本族语者做问卷调查,然后总结说,他生成的句子有多少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有多少人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有多少人模棱两可。这说明这位学生生成的句子还得让归纳来验证可接受与否。

(5) 语言学理论的完善性。 语言学理论中的某些流派往往会过分强调本理论如何完善,如何具有科学性。实际上,没有一个语言学理论是十全十美的。我在悉尼大学留学时,我和同学们经常向韩礼德提出一些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说不清楚的地方,他的回答给我影响很深。他认为,不要以为一种理论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如果一个理论如此完美,挑不出毛病了,提不出新问题了,意味着这个理论的终结,难以继续发展。他又进一步说,如果你们有问题,不要期待我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们是研究生,大学招你们这些研究生,就是要你们来研究问题,和我一起来研究问题,一起把系统功能语言学搞得更完善些。这些话我一直牢记在心,成了我的座右铭。

(6) 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由于出席沙龙的教授们有搞生成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也有搞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在一些问题上难免有碰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早在1990年社科院语言所在上海召开的“国外语言学研讨会”上有所表述。^②我发言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当代语言学

两大流派——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有相互靠拢的趋势。从形式主义的生成语言学看，除S、NP、VP外经常可以看到主语化、主题化等语言功能的表述。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功能主义从来不拒绝形式主义的描述，韩礼德的概率描写或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都采用了形式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形式与功能两者之间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但我又提出这样的观点，两者永远不能合二为一，过一段时间人们有了新的认识，又会离得更远。如同我在前面所讲的一样，如果真的统一了，语言学这门学科就很难继续前进。科学的魅力就在于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对立，在讨论以至争辩中不断完善，不断前进。朱德熙先生访问澳大利亚时，中国留学生和他讨论流派问题。他说得很干脆，理论好不好，“拿出干货来！”令人绝倒！

(7) 否定之否定。不论是系统语言学的韩礼德，还是生成语言学的乔姆斯基，在治学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我最早是与北京语言大学方立教授一起研究乔姆斯基的，由于种种原因我转入系统功能语言学，其中之一就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变化太快。刚弄清楚一个模式，很快又换了一个模式。后来，对这同样的事例我有了新的看法，乔姆斯基有可爱之处，当他认为自己正确的时候，他可以和人争辩得脸红脖子粗，一点不让人；但是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理论有不足之处，他敢于否定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不厌其烦。同样，韩礼德的理论也有经过不断修正的过程，不论是对语言系统的认识，及物性的范畴，以至语法隐喻，在不同时期一次比一次说得更清楚。因此，当我的一位学生，在研究中提出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未得到他所期待的喝彩后，他曾经迷惑地说，“你不是一直支持我的吗？”我向他解释说，“我支持你创新的精神和论文中的一些亮点，但不是所有的观点。你在某个问题上的新意或突破，并不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建立。”他又说，“Longacker最初搞认知语言学不是许多人反对吗，后来不是搞出来了吗？”我说，“对，他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把他的理论逐步完善。你才搞了一两年，就认为自己的框架

如何好，别人的框架如何不好。当别人提出质疑时，你不能从如何解决这些质疑中所提出的问题去多考虑吗？”

胡壮麟

2006年12月

注释

- ① 2006年9月上旬我从美国探亲回京，接到后尘先生来电，要我参加9月21-24日的“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并在大会发言。我当即告诉他参加开幕式可以考虑，但要在两周内拿出一篇学术论文，实在无能为力，如果粗制滥造，岂非与大会反对学术腐败的主题相忤，顶风作案不可为也。待开幕式后，有幸听到教育部领导和国内著名教授的精彩发言，感慨良多，在大会最后一天，后尘先生让我上台致闭幕词。不料我一上台忘乎所以，一吐为快，超了时间。事隔3月，后尘先生突然向我要书面稿。当时是即兴之作，现只能凭记忆所及，将功赎罪。
- ② 胡壮麟，2000年，功能主义纵横谈，《外国语》2000年第3期，3-9页，收录于胡壮麟著《功能主义纵横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9月。

序二

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生命在哪里？

张后尘先生为推动外语界的学术进步,为研究和开创教学与科研的创新之路,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发起了“中国外语教授沙龙”,从2001年10月起已经举办了3次。第一次在大连,主题是学术创新和“两张皮”问题,出版了文集《来自首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第二次在长沙,主题是学术创新和方法论问题,没出版文集。第三次在北京,主题是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要出版文集,张先生授命我为这本文集写篇序文,我不敢怠慢。

题目中“沙龙的生命”为何意?我想和大家讨论如何把这种沙龙形式的学术活动较长时间地开展下去,而且确实能产生新思想、新方法,进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说明“沙龙”具有生命力。

首先“沙龙”的概念应说明白,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外语教授沙龙既不能是西方历史意义上的 Salon, **a regular social gathering of eminent people** (especially writers and artists) at the house of a woman prominent in high society or **a meeting of intellectuals** or other eminent people at the invitation of a celebrity or socialite(NOECD,SFLEP2007,第1879页),也不应是我们通常举办的那种学术研讨会,而应是外语或非外语多学科老中青教授中水平较高、学术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有凝聚力的小型队伍(最好不超过30人)的学术会议。它的生命力主要在于以下的几个条件。

1、要有几个(5~7人)不同学科但志同道合的学术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学界公认的。他们首先是热心学术,胸怀坦荡,无功利,有凝聚力;其次学术水平较高,最好能通中外,通古今,知文理,学术思想活跃,眼光敏锐,视野开阔;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能提出并能引导

讨论重大的学术问题。可由他们组成沙龙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

2、要十分明确沙龙的学术目标不是解决某个学科的具体问题，而是以创新为灵魂不分学科集中探讨如何创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坚持这样做需要两个条件：

(1)学术领袖善于从多学科研究中发现需要突破的理论观念或者研究方法问题；(2)与会者要深知自己学科的历史和熟悉其前沿问题，并善于跟别的学科进行纵横比较。

3、沙龙每次都应邀请外语界之外的著名学者介绍评论他们学科发展中的难题和解决的思路、方法与过程。所邀请的学者应该依据所探讨问题的需要，比如探讨语言意义的来源与类型问题需要请精通语言哲学的学者，讨论方法论中的层次与系统问题需要请精通系统科学的学者，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需要请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因为涉及公理和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研究翻译过程问题就需要请深知阅读心理与写作心理的心理学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借鉴其他学科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4、沙龙最好两年一次，每次都应有一两个中心议题（如果两个必须密切相关，不要超过两个），要给参加者一年以上的准备时间，要求他们必须围绕中心议题写好文章。要通过审稿会选出2~4人作主题发言（最好选分歧较大的），开会时不人人轮着宣讲论文，主持人要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对话和争论。要做好全程录音，有录像更好，以备整理、选择、发表。

5、这种沙龙形式主要是围绕中心议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多取向、多领域的步步深入的对话和争辩，因此就对主持人要求很高，不但知识面要广而深，而且要十分熟悉与会者的学术专长，还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有步骤的一步地引向深入。为了深入讨论，要不断地抛出问题，不时点将发言，而不能任其自然的让举手者变相轮流宣讲自己的论文。这种形式我们可以借鉴美国 A.F. 奥斯本发明的“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因为这种方法倡导思想高度自由，想法新奇，甚至不

惧荒唐；倡导利用别人的想法诱发灵感，开拓思路，追求想法新想法多；严格遵守“保留批判原则”，即对话过程中对任何意见不得阻拦，不能批判，不做任何评论性判断，批评可放在最后单独一段时间。奥斯本认为，只有与会者严格遵守“保留批判原则”，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Brainstorming。这种方法有利于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引起联想和连锁反应，是一种有助于集思广益的集体思考的方法。（秦铁辉编著《科学活动与科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1—234页）

6、每次沙龙结束后应有两项成果，一项是对话的整理和精彩部分的选择与发表。沙龙结束后要委托2人写出包含部分精彩对话的综述，经主席团成员审阅后，在适当刊物上发表。另一项是编辑出版沙龙文集。文集的选编要严格把关，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精选确有创新的文章编辑成册。

7、最好有热心我们沙龙活动的刊物主编和出版社社长参加沙龙主席团，以利于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

以上几条是我设想的，和我们通常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相比似乎要求偏高，或者还带点理想的成分。但我个人感觉如不这样要求，那它就和其他学术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美国曾经用召开类似沙龙这类学术会议创建新学科的故事。“1956年夏季，由年轻的数学家麦卡锡和他的3个朋友明斯基、罗切斯特和香农共同发起，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大学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班，历时两个月。在这个研讨班上正式使用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术语，这标志着人工智能这门学科的诞生。”（熊立文著《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另一个是社会语言学诞生的故事。“‘社会语言学’在美国得到正式认可是在1964年，这一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社会语言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olinguistics）召开了一次为期8周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联合讨论会，从此社会语言学在美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胡明扬“拉波夫和社会语言学”，

载《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1期,第25页)这两个故事充分说明了用类似沙龙的学术会议形式集中多学科学者的智慧可以切实有效地推动学术的发展和创建新的学科。这种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我们沙龙的建设应认真从中吸取他们的创造精神和适于我们的做法。

我们自己也有可吸取的经验。于根元先生曾用大约1年时间联络60位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其中5位为海外学者),在不同地方组织了18次语言研究的对话,讨论了20多个专题,归纳出58个重要的见解,出版了31万字的《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年),经过梳理还编写出版了《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王宾、张志林与倪梁康三教授于2003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翻译与诠释”跨学科研讨会(Translation as Hermeneutics),来自京、沪、穗、宁、港、澳、鲁等地的22位学者从哲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宗教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就翻译和诠释的关系以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展开了跨学科的对话与争论。这次对话的结果就是王宾编著的《翻译与诠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我们应从上面这两次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吸取4个方面的经验来建设我们的沙龙:选好主持人;拟好中心议题;选好不同学科的参会学者;做好录音录像,整理加工对话文字材料。

祝愿我们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生命之树常青!

杨自俭

2007年7月26日记于中国海洋大学

前言

《来自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简称《报告》),是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2006,北京)与会学者以“学术规范与外语科研的自主创新”为主题的学术论著。

《报告》分4个方面,选收论文34篇,其中博导、教授的论文31篇,占总量的91.18%,其中著名学者有申丹、胡壮麟、沈家煊、徐盛桓、钱冠连、刘宓庆、宁春岩、杨自俭、辜正坤、潘文国、黄国文、王寅等。

在《报告》编辑中,著名外语教育家、语言学家胡壮麟、杨自俭分别为《报告》作序并给予多方面的指导。

这次沙龙把“学术规范”与“自主创新”链接在一起作为主题,说明主办单位高瞻远瞩、顺应大局,“学术规范”与“自主创新”二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不抓学术规范,不整肃学风,不遏制学术腐败,就没有自主创新可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资源共享,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因此,这次沙龙唤起代表们一致的共识:我们必须从民族利益、国家兴衰乃至世界文化积累上承载起学风建设的重任。

作为沙龙主题重要部分的自主创新,是多数论文涉及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论证自主创新的途径,涉及创新内涵、方法论等诸多问题。《报告》论点深刻,切中肯綮,反映我国外语学者紧跟时代,坚持科学发展观,挺进学术前沿的创新追求与伟志,展现了学者们“与时而变,不袭一体”的开拓精神。学者们在论文中提出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成果,使我们看到了自主创新的光明前景,增强了信心。从语言学研究的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失语症入手,论述自主创新的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拓展外语学人的学术空间,提高外语学人在国内外学术界地位,找回失落的学术研究理路,发挥外语学人的特殊资源优势,做引导中国学术前进的先锋,这是一个寓意深远的呼唤。从语言学家的任务、目的到研究者要克服空谈理论的现象,多做个案研究,实现继承和

创新的跨越,为外语研究者指明了方向。探索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开阔了研究视野。“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的论文引起广泛关注,论文提出“一个国家学术上最兴旺的标志是流派纷呈,它决定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没有话语权”。

《报告》的出版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组委会对高教社领导深表谢忱。

张后尘

2007年7月25日

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纪要

加强学术规范建设 推进外语科研的自主创新

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于2006年9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外语》杂志社、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了这次盛会。这次沙龙的主题是：学术规范与外语科研的自主创新。近百位专家、学者和主管领导莅会，他们分别来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40多所高等学府和科研单位。沙龙收到论文60余篇。

第三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召开经过充分准备，会前组委会与几家合办单位召开了5次磋商会议，落实有关工作。组委会与全国著名学者通电达30余次，听取各方面的建议。胡壮麟、杨自俭、张柏然、钱冠连、徐盛桓、潘文国、戴炜栋等学者，还就会议主题报告、特约人选等问题提出具体思考，给予积极支持。徐盛桓、张柏然、郑延国等教授为本次沙龙题词祝贺。杨自俭先生发来专函，谈教授沙龙的宗旨和目标，以及沙龙的运作办法。其情其义，令人十分感动。

沙龙开幕式在高教社多功能会议厅拉开大幕。会场气氛浓烈，学者云集，高朋满座。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张增顺代表高教社到会致词，对本次沙龙主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主题更具时代性，切中当前我国学风建设和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高等教育出版社（集团）副社长、《中国外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刘援在外访问途中来电祝贺。

在开幕式上，教育部社科司袁振国副司长做了重要讲话，介绍了国

内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问题与形势,对本次沙龙把学术规范提到重要议题探讨,给予充分肯定。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宁教授做了“语言学学风建设的现实与理想”的专题报告,她认为语言学界种种不端行为,以及学术功利化带来的泡沫学术给学术界造成的危害,学术批评中的党同伐异,严重影响了健康的批评与反批评,她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出现学术腐败的原因。

在这届沙龙中,学者们对“自主创新”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点,真是处处真知灼见。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博士生导师徐盛桓教授的主题报告“‘照着讲’和‘接着讲’——当代语言学研究自主创新问题的思考”,开门见山地提出:“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研究队伍可能是世界最大的,但许多人研究的模式基本上是短平快的追风;二、许多研究者缺乏把握语言现象本质的能力、原创力和理论提升能力……”

徐先生在报告中提出两个值得反思的后果,即语言学研究表现出很大程度的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失语症。

徐先生指出:“照着讲”不是低水平重复,“接着讲”要有开创性研究。最后他认为中国语言学研究要回归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回归到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取向,回归到语言学研究的流派意识和回归到精品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在进一步论证自主创新时提出,“要克服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也要研究语言理论,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研究语言”,为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辜正坤的报告从学术研究理路和前途展望的角度,针对当代外语人面临的学术研究困境,考察了单项研究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讨论了如何拓宽外语学人学术空间、提高外语学人在国内及国际学术界学术地位的基本理路和方法。他大力提倡英语界